

海峡两岸新闻与传播研究丛书

台湾报业史话

曹立新 著



CROSS-STRAI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台湾报业史话

曹立新
著

CROSS-STRAI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报业史话 / 曹立新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108-3259-8

I. ①台… II. ①曹… III. ①报纸-新闻事业史-台湾省 IV. ①G219.24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7930 号

台湾报业史话

作 者	曹立新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259-8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厦门大学海峡两岸新闻与传播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张铭清

副主任 黄星民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序)

曹立新 陈飞宝 黄星民 黄裕峯

余绍敏 叶 虎 赵振祥 邹振东

朱至刚 庄鸿明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回到解禁元年	(1)
第二章 报禁政策及其新闻管制	(19)
第一节 从戒严到报禁	(19)
第二节 大棒子加胡萝卜	(37)
第三节 新闻自由与自律	(62)
第四节 潮流变了	(68)
第三章 威权统治的侍从与对手	(76)
第一节 党报的荣与悲	(76)
第二节 两大报系的崛起	(88)
第三节 “小媒体”的反抗	(115)
第四章 巨灵的控制与无权者的权力	(136)
第一节 大者恒大 赢家通吃	(136)
第二节 世界变了 何以立报	(147)
第三节 独立媒体 另类突围	(161)
参考书目	(172)

第一章 引言：回到解禁元年

这故事一言难尽，我们就从明天开始——黄哲斌

“我的大革命”

2010年，对于《中国时报》调查采访室的工作团队而言，是异常忙碌也颇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他们相继推出了“我的大革命”、“民国九九，台湾久久”、“不景气不低头”等系列报道，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民国九九，台湾久久——台湾百年文化内涵与集体记忆”，获得吴舜文新闻奖文化专题报道奖。《我的大革命》专版集结成书后，也获得“开卷好书奖”中的“美好生活书奖”。

然而，该团队当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却不是这些报道本身，而是团队成员、记者黄哲斌年底向报社辞职。对于台湾新闻界而言，上述所有报道引起的反响，加起来都不如黄哲斌一篇谈自己辞职事件的博客——《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这篇博客写道：

是的，我借用了 John Denver 的经典老歌歌名，“Leaving on a Jet Plane”，我最近常哼唱这首歌。顺带一提，此曲于1966年发表时，原名为“*Oh Babe I Hate To Go*（喔，宝贝我不想走）”，好吧，两者都能代表我的心境。

因为从昨天起，我离开了工作十六年又五个月的《中国时报》。

离开的原因很单纯，不是跳槽、不是资遣，不是优离优退，而是“我再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个值得托付的行业”。

说来矛盾，两年前，我调回报社担任调查采访室记者，期间沾了一群优秀同事的光，陆续参与“我的大革命”、“民国九九，台湾久

久”、“名人家族故事”、“不景气不低头”等系列报导，两任总编辑给予极大的尊重与空间，一方面，这差事是值得卖命的、这报社是值得卖命的。

另一方面，我越来越难独善其身、越来越难假装没看到，其它版面被“业配新闻”吞噬侵蚀的肥大事实，新闻变成论字计价的商品，价值低落的芭乐公关稿一篇篇送到编辑桌上，“这是业配，一个字都不能删”。

然后，它们象是外星来的异形，盘据了正常新闻版面，记者努力采访的稿件被挤压、被丢弃。记者与主管被赋予业绩压力，不得不厚着脸皮向采访对象讨预算、要业配，否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不配合报社政策”。

一家亲爱的报纸同业，甚至采取浮动薪资，广告拉得多，业绩达成率高，才能享受较好的待遇。另一家报纸主管开会时，公然指责不配合的女性同仁说，“大家都在卖屁股，你不要自命清高”。

于是，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政府与大企业的手，直接伸进编辑台指定内容，这是一场狂欢败德的假面舞会；花钱买报纸的读者，却不知道自已买了一份超商 DM 与政府文宣。

所以我递了辞呈，辞职理由填写很翔实：“台湾报纸业配新闻领先国际潮流，自认观念落伍告老还乡”，我希望留下纪录，或可作为一种温柔的抗议，一种委婉的提醒。

.....

我的人格并不清高，我也不是吃斋念佛，难道我不想点头如捣蒜说“好好好好好”？我当然想，想得要命；只不过，我更相信，“人生总有非卖品”，并非世间万物身上，都有一个标价牌。

例如，读者的信任；例如，专业判断与良知；例如，自己的人格与报社的信誉；例如，写或不写的自由权利。

业配新闻破坏了一切，夺走了这一切，它以每字一、两百元的代价，将新闻变成廉售的开架商品、“集成营销”名目下的一项配件、政府标案的简报甜蜜点。抗拒业配的主管或记者，反而变成害群之马，变

成昧于现实的唱高调者，变成观念落伍的侏罗纪恐龙。

所以，我承认自己老了，笨了，落伍了……

我最近重读五年前，前辈记者林照真在《天下》的深度报导：《谁在收买媒体？》，感触益发深刻；五年来，台湾媒体的怪状不但没变少，而且业配手段越发“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没笔误），从业者的痛苦挣扎尤甚于前。

几年前，我仍任职于中时电子报，当时目睹业配新闻“和平崛起”，广告主试图介入新闻产制流程、试图让记者与编辑成为企业公关部门的附庸。然而，编辑部至少还肩负守土之责，换句话说，“吵完一架大多还挺得住”；而今，零星战役早已结束，专业伦理的防线一路溃退，除非你抱定“不干最大”的决心，否则只能眼看新闻版面逐步被广告侵蚀、瓜分，更可怖的是，你无法望见未来的底线。

这故事一言难尽，我们就从明天开始。^①

“我的大革命”最富戏剧性的影响，无疑在于它影响了报道者自身。黄哲斌说，每一个小革命故事的主角，都让他相信，“勇敢去做，绝不会孤单”。他由此加入到颠覆主流的行列，以实际行动对抗台湾媒体业已深入到新闻产制每个环节的“置入式行销”。调查采访室负责人何荣幸评论说：“就这样，我们辛苦耕耘、锲而不舍的小革命专版，在两年后开出了哲斌的大革命灿烂花朵。”

黄哲斌辞职之后，前中视新闻主播、新闻企划室主管刘蕙苓也以黄哲斌的方式“响应黄哲斌”，留下一声叹息——“原来我这么不专业?! 就这样离开了电视新闻界”。^② 无独有偶。此前一年，《联合报》记者朱淑娟同样因为不满“置入式营销”对台湾新闻业的扭曲，离开了“不再报道真相”的媒体；再之前，《中国时报》记者林照真有感于在媒体的商品化大潮下，记者由“看门狗”变成了“哈巴狗”，大喝一声“记者，你为什么不反叛”，

① 黄哲斌：《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http://gb.chinatimes.com/gate/gb/blog.chinatimes.com/dander/archive/2010/12/13/579524.html>。

② 刘蕙苓：《原来我这么不专业?! 就这样我也离开了电视新闻界》，<http://blog.udn.com/al-exandroslee/4732524>。

离开媒体，转身成为大学教师；更早些，因为不堪忍受台湾媒体充斥着侵害人权的报道和置入性营销，新闻沦为另类公害，记者关鱼毅然离开服务多年的报社，创办了独立媒体《台湾好生活电子报》，试图以新的方式满足受众真正需求，为台湾媒体留下未来的希望。猪小草、彭瑞祥、冯小非……近10年来，台湾不知有多少优秀媒体人离开了这个行业，就连何荣幸那样虔诚的新闻圣徒，以“废墟开出一朵花，乱世守护一亩田”的精神，和“做多少、算多少”的务实态度，不断寻找媒体突围的方向，却也在长期的焦虑挣扎中，“几度疲惫无力到想要离去”。

追求媒体独立，不畏强权与金钱，从来都是新闻史上的主题故事，也是历经台湾报禁时代的英雄记者们引为自豪的传奇。当年，因为受到报禁开放的启蒙，林照真、何荣幸、黄哲斌等新生代相继投身报业，决心从前辈手中接过新闻自由的旗帜，为台湾的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再立新功。可是，谁能想到，短短十数年间，新闻理想在台湾居然变成可笑的侏罗纪恐龙，忠于专业操守的记者，也被视同与风车搏斗的唐吉珂德。与经历报禁的老一代记者相比，如今的新闻人，再不必害怕老大哥的监视，也不必担忧莫名的文字狱，没有挺身而出的风险，也没有曲笔为文的委屈。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多元异质、政党撕裂、利润挂帅、娱乐至死的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不信任，内外压力下的无助，都让他们感觉到，虽然刚刚走出报禁的铁幕，却仿佛又陷入另一个漫长的黑夜之中，煎熬与叹息，奋起与突围，依然难以找到指路的星星：

一党独大的政治威权虽已走入历史，取而代之的却是媒体老板的鲜明立场，以及广告主无孔不入地强势入侵，新闻专业依旧饱受媒体意识形态与政商力量的干预侵蚀；新闻工作者虽有更大发挥空间，但媒体政治立场分明、收视率挂帅、臃色腥当道、侵犯基本人权却让新闻专业尊严荡然无存，新闻工作权在不景气声中更是风雨飘摇。也就是说，过去箝制新闻自由的敌人虽然恐怖巨大，却可能透过挑战威权体制的途径看见幽微亮光；现在“敌人”已不时化身为媒体老板、高层主管、各类广告主、收视率竞争、阅报率调查、自由市场机制、经济不景气、记者自我设限、工作权饱受威胁，密密麻麻包围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却

还看不出整体脱困的有效途径。^①

老大哥刚刚离去，孔方兄粉墨登场；威权魔掌才收起，市场巨灵又降临；原以为迎来了光明，却不料步入另一种黑暗。

黄哲斌的辞职，虽然引发台湾传播学界与公民团体的积极串联，迫使“总统”、“行政院长”亲自出面，宣示今后不再做政治置入营销。当局“用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的荒谬现象，或许可望告一段落。可是，“卖新闻赚钱”，买家岂止有当局？除了置入式营销，当局是否会采用其他方式操控媒体？走出报禁的台湾报业，能否走出市场的控制？新闻业，这一在西方被推崇为第四权力、在中国寄托了文人论政之理想的行业，曾吸引万千年轻人以它为终身志业，为何在今日台湾，竟变成不值得托付的行业，甚至被讽刺为制造业、修理业、屠宰业？

这是一个有关媒体、官方和市场的复杂故事，是一个关于台湾传媒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漫长故事。追根溯源，故事还得从30年前台湾媒体的快速开放谈起。换句话说，要理解台湾媒体今日的病症和台湾新闻人今日的痛苦，不能不将时间拉回到解禁元年。

迈向新时代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1988年元旦，对于台湾报业和台湾报人而言，尤其具有新气象。从这一天开始，在台湾实行近40年的报禁政策终于解除。

这一天，台湾读者早上起来，发现当天的报纸与往日不一样，《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等都变成6大张24版，花花绿绿一大摞，不仅厚度比平常增加了一倍，版面、内容也都充满了新意。

这一天，《中国时报》头版刊载了《报禁今天解除》的醒目新闻。新闻说：“中国时报以创办一份新报纸的心情和做法，迎接报禁开放。”

这一天，《联合报》同样以欣喜与期待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这一天报纸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题为“迎接中国历史发展划时代的一年”：

① 何荣幸：《媒体突围》，商周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1988年于今天揭开序幕，进入中国历史发展划时代的一年。这是解除戒严令后，宪政迈向政党政治变革的一年，宪法与法统间的关系，在这一年，将形成宪政最大的考验，最大的突破，而出现崭新的局势。

这是外汇管制开放后，经济发展向自由化、国际化升高的一年，面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惊涛骇浪，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必引发财经金融的全面性互动激荡。一个新的“起飞”年代，会带给台湾奇迹新的价值判断。

这是开放大陆探亲后，海峡两岸掀起新的竞争的一年。我们的大陆政策与中共的统战政策，都面临局势演变的挑战与考验，中国的统一问题，将在这样的考验下，酝酿一种新的模式。

这是解除报禁，新闻言论自由势必涌起空前高潮的一年，新闻言论自由对国家社会安全与整体利益的影响，对人权与人民合法权益的提升，对人民参与意志与公意的激发，都将为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导致本质的蜕变。

这是中华民国走向开发国家经历经济发展的过程而达成政治成熟的一年，开发中国家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矛盾，自由文化与威权文化的矛盾，在这一年将有更剧烈的破与立的形势消长……

在这一年，执政党与政府必须正视报禁解除后，报纸竞争与新报设立所再现的传播意识形态多元化与新资讯文化的强烈批判性，执政党与政府都必须走出宣传与文工的传统意识，努力通过求新求变的实质改革行动，赢取有利的资讯诠释与回应……

运用大众传播的功能，确切的导引公意及表达公意，俾使社会均衡得以维持，政治进步得以加速，乃是新闻事业迎接报禁解除新形势的严肃使命，本报将自明日起发表一系列社论，对今后国家社会向前走向前看提出建言。^①

另一篇则是专门为了“迎接开创报业新纪元的一年”：

^① 社论：《迎接中国历史发展划时代的一年》，《联合报》1988年1月1日。

报禁的开放将使这年成为中国民主宪政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它不止表示民主自由落实在人民的最基本权利上，也不止象征开放社会的实现，更紧要的，乃是新闻言论自由会带来国家社会更大的活力，更广更深的厚植民主基础，而又将民主充分表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上，这是对人民思想的解严，其意义尤重于政治与社会行为上的解严。我们可以强调说，这是民主宪政最耀目的成就。报禁的解除，使中华民国可以除了享有“新兴工业国家”的令誉外，复受国际间肯定为“新兴民主国家”。^①

这一天，《中央日报》特别邀请赖光临、汪琪、王洪钧、皇甫河旺等主持政治大学、辅仁大学等新闻院系的专家学者进行笔谈，发表他们对报禁开放的看法，并制作专版——《报纸开放后的省思》。编者特意加了按语：

期待已久的报纸开放政策，从今天起付诸实行，不仅将提供全国民众更丰富的资讯服务，同时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建设，也将在更健全的舆论制度下，迈向一个开放进步的新时代。

此前，台湾省报业协会和台北市报业协会发表了《迈向一个资讯健全的新时代》的联合声明。走过漫长的戒严和报禁时代，历经当局的压制与束缚，所有曾经在威权恐怖之下追求过自由、在黑暗中寻找过星星的新闻人，从此“奔向自由开放的年代”。^②那一刻的心情，何荣幸曾经作过生动的描述：

这群人亲身见证，台湾这艘希望之船离开戒严、报禁港湾，从此航向广阔无边、深不可测的民主海洋。他们虽然参与其中、记录过程，却也只能载浮载沉，不知道大海的另一边究竟还有多少风浪。

① 社论：《迎接开创报业新纪元的一年》，《联合报》1988年1月1日。

② 胡元辉：《“黑暗之幕”将成事实？——戒严与报禁解除二十周年的忧思》，载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编：《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远流图书公司2008年版，第13页。

这群人散布在最保守到最激进的媒体。他们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高压气氛中匍匐前进，姿态多半扭曲变形，很难保持优雅好看。有的人在主流媒体内兢兢业业，有的人想尽办法在文章中“埋地雷”鼓吹民主，有的人努力从中南部发声，有的人深入观察民间社会，有的人则与情治单位大玩“捉迷藏”游戏；后人想象他们坚定勇敢，他们身处其中却可能狼狈不堪。

他们像是在无尽的黑夜中寻找星星，对外迎向忽明忽暗的民主亮光，对内追寻若有似无的记者典范。^①

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港湾驶向海洋，从荆棘走向鲜花，从枷锁走向梦想。

报禁开放，绝不仅仅是报纸登记与张数的开禁，更是全体新闻人精神和心灵上的开放。^②解严前不久从电视台转到《中国时报》工作的年轻记者林照真回忆说，解严对她有着极大的启蒙作用：

解除报禁时，我被告知从此写作没有检查了，张数也没有限制了，竞争对手增加了，报社要大家思考如何因应报禁开放，而有不一样的作品。很多事已不复记忆，我只记得，我在那一个时代后，我的心里上有了更大的解放空间，知道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这样的心情，对我来说是兴奋的。没有了时代的枷锁，所剩的就是不断追寻自己的新闻梦。^③

没有了时代的枷锁，所剩的就是不断追寻自己的新闻梦。报禁解除后，一大批怀着新闻梦想的年轻人，像林照真一样加入到媒体行业。那时候，报纸对人才需求急剧膨胀。那时候，每两天就增加一张新报纸。

每两天增加 1 家新报

1988 年 1 月 21 日，台湾解严后第一张新报纸《自立早报》创刊。该报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 2008 年版，第 28—29 页。

②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1999 年版，第 357 页。

③ 林照真：《报禁解除对我是一种启蒙》，http://ban-lift20.blogspot.com/2007/10/blog-post_5431.html。

日出5大张，售价10元新台币，首日开印17万份报纸。已在晚报市场独占鳌头的《自立晚报》信心满满，不仅欲借此举进军日报市场，与《联合报》《中国时报》一较高下，其志向所指更在打造出与中时、联合鼎足而三的“自立”报系。其创刊词宣称要“办成功一份自由报业的典范报纸”：

本报现在投资人自民国四十八年接办自立晚报，二十九来无时无刻不期盼同时发行早报……惟因报禁，未能如愿。去年2月，政府敲定解禁政策后，我们夙愿得偿，立即着手早报筹备工作……

我们愿在自立早报创刊的今日，再一次揭橥我们办报报国的理想，以与同人君子共勉。

我们一向认为办报不同于经营一般营利事业，大众媒体之作为社会公器的本质，所有报人合当奉为天经地义。我们基于这种信念，将投资报业视为一种奉献，投资人不以经营报社作为生活之根本，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我们将继续维护这宝贵的传统，不稍更易……

我们承袭母报——自立晚报的传统，仍以“无党无派、独立经营”作为我们办报的最高标杆……自立早报的编辑方针、发行方针、广告方针，便是完全以“办成功一份自由报业的典范报纸”为最高理想的彻底落实。

报纸还专门刊载了吴三连手撰的《自立报系社训》：“我们信奉新闻自由至上，我们肯定遵循客观报道公正评论的准则，可以促成文化改革人类和谐世界和平，我们信奉国家利益第一，我们肯定坚守无党无派独立经营的立场，可以增进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公道，我们信奉公众福祉为先，我们肯定一本有为有守诚挚奉献的精神，可以获致充实生存尊严生命永恒。”^①

这是报禁开放后台湾出版的第一份新报纸。《自立晚报》“二十九年来无时无刻不期盼同时发行早报”，在创办新报中拔得头筹。联合、中时两大报业巨头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新竞争，也早已在报禁开放前夕砸下重金，投资人才、设备，在市场等方面设置高位门槛，以卡住有利地位，可谓虎视眈

① 社论：《办成功一份自由报业的典范报纸》，《自立早报》1988年1月21日。

眈，志在必得。

《自立早报》创刊1个月后，2月22日，《联合晚报》创刊。又过了几天，3月5日，《中时晚报》创刊。半年后，7月12日，曾经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民生报》等著名报刊，并以上海《立报》创下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报纸发行纪录的一代报人成舍我，终尝“报禁不除，决不办报”的夙愿，以92岁高龄创办了《台湾立报》——创下世界新闻史上创办人年龄最高的纪录。又过一年，1989年6月，台湾党外著名政治领袖人物、“立法委员”康宁祥创办《首都早报》，从各报挖角，聘请著名记者戎抚天出任总编辑，其他援引人员不乏一时之选，其创刊宗旨揭橥“忠实传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一份真正属于台湾社会的报纸”，又引来报业市场不小的震动。

除了这些重拳出击，还有许多只闻雷声不见雨滴的未出版新报，以及更多新报蓄势待发、即将创刊的各种消息。据“内政部”统计，报纸开放2个月内，新申请登记报纸33家，平均每两天增加1家，超过以往40年存在的报纸总数。1988年，全台湾新登记报纸超过100家。1991年，新报登记竟达217家。^①到1991年年底，“行政院”登记的报纸共有253家，实际出版是为154家。^②报禁开放后至1998年11年间，累计发出报纸登记证的家数，包括一日刊和多日刊，计达883家。^③

“昙花一现的繁荣虚象”

如久旱遇甘霖，报禁的束缚一旦冲破，创办新报的潮流便汹涌而至，沛然莫之能御。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股热潮，来得猛，去得急，潮起潮落，只维持了短暂的“昙花一现的繁荣虚象”。^④

因为有太多的喜悦和憧憬之情，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报禁开放后台湾报

① 黄天才：《新闻通讯事业》，载“中国新闻学会”：《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24页。

② 荆溪人：《报业》，载“中国新闻学会”：《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7页。

③ 苏衡：《竞争时代的报纸：理论与实务》，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④ 黄天才：《新闻通讯事业》，载“中国新闻学会”：《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23页。

业发生的第一件重要之事，不是新报创刊，而是旧报停刊。1988年元月，与报禁开放同一天，创刊于1950年，长期与《自立晚报》《民族晚报》并称台湾三大晚报的《大华晚报》宣布停刊，成为报禁开放后第一家停刊的报纸。

1990年8月28日，《首都早报》在一版刊登《敬告读者》，宣布：“首都早报今日起，因财务困难而暂时停刊，预期改组完后以重新的面貌复刊。”但是，读者们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该报“以重新的面貌复刊”。《首都早报》创刊两年来，可谓风头甚劲、风光无限，曾以斗大头版标题《干！反对军人组阁》，引领各大报跟进报道而名噪一时，并以《媒体与不实广告》为主题的15篇连续报道荣获金鼎奖公共服务奖，岂料仅仅风光了1年零2个月，便因“资金不足”宣布停刊，成为寿命最短的新报。

《首都早报》停刊后，一家民营报纸发行人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便坦言，大家都在亏损状态下咬牙苦撑，看谁先倒下去。^①仅仅过了10天，果然又有报纸倒了。9月9日，经营了1年2个月（1989年7月1日创刊）的《环球日报》宣布停刊。该报创刊之初，曾标榜师法《大公报》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精神，其主力成员均从各大报挖角而来，号称“只有这群家伙能办《环球日报》这样的报纸”，被视为报业市场上一匹黑马。可是，仅仅过了半年，该报就人事日非，亏损累累，每月亏额高达2000万元。^②报社内部气氛，也由创办之初的朝气蓬勃逐渐变得暮气沉沉，许多采编人员挂冠而去。后来虽经整肃，甚至停刊前一个月还大登广告，以月薪70000元征求员工，^③依然无法渡过难关，终于偃旗息鼓。“创刊容易续刊难”。投资没有止境，回收却遥遥无期，绝大多数新报不到一年半载就销声匿迹了。报禁开放后，市场化的商业竞争取代了原来当局的政策禁止，成为报业的“新设限”。对新手而言，过去格于禁令，难以创办新报，现在却格

① 忻圃丁：《报业经营将有苦拼》，《新闻镜周刊》第97期，1990年9月10日至9月16日。

② 叶毅祥：《经营方式失措 环球日报停刊》，《新闻镜周刊》第99期，1990年9月24日至9月30日。

③ 徐凤鸣：《人事倾轧乱阵阵 环球日报处境艰》，《新闻镜周刊》第67期，1990年2月12日至18日。

于市场，无法竞争即难以为继。^①《首都早报》每月平均亏损达1300万元，原有两亿资金悉数赔尽。后期虽然曾以赠品、抽奖、在超市免费赠阅等多种方法强力推销，仍然无法挽回停刊的命运。^②

报禁解除，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带给台湾报业一片广阔的发展空间。报禁开放前，对于如何解禁，台湾报界曾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是完全解禁，两大报力主取消一切管制，完全由市场调节。第二种是有限解禁，小报主张应逐步开放，先限制大报的扩张，使小报及新报有生存的机会。结果，当局采取了完全解禁的做法，对于未来报业的市场行为，也未作出规范要求，给未来的竞争埋下危机的种子。^③

事实上，报禁开放前夕，联合、中时两大报系为确保市场绝对优势，纷纷在人才软体与设备硬体上大量投资，在固守原有地盘的同时，加高产业进入障碍，加重新进入者的“卡位成本”，消耗资本弱势的新竞争者。以联合报业为例，新投资了林口、台中及高雄印刷分厂，购买高斯印报机、新力影像传输机、Grosfield平版传版机、财务系统电脑化等，总计达27亿新台币。中时报系的采编人员，则由报禁开放前不到2000人，一年内急速成长到4000人以上。报业人力市场价值猛涨，新进报业薪资负担加重。^④

踌躇满志的新报纸，往往在正式出版发行之后，才发觉报纸赖以生存发展的发行及广告，都已被联合、中时两大报系牢牢掌控，新报难以插足，也无从问津。在旧有大报的封堵之下，新报几乎没有存活空间，加上新办报纸，投资巨大，人才缺乏，没有一家不是赔亏累累。因此，报禁开放倒使大家认清了一项事实：原来是报禁政策保障了台湾原有31家报纸的生存。

报禁时代，持有报纸登记证，如果报纸办得不错，就继续办报，不断发展；如果报纸办得不好，不堪赔累，就将登记证转移出手，不仅可以弥补亏

① 林正国：《中央日报改革的决心与作法》，《新闻镜周刊》第86期，1990年6月25日至7月1日。

② 尹子扬：《首都早报宣告停刊 报业经营更添寒意》，《新闻镜周刊》第96期，1990年9月3日至9日。

③ 林丽云：《报业，夕阳业，为什么？》，转自《报禁解除二十年》，<http://ban-lift20.blogspot.com/>，上网日期2007年12月20日。

④ 皇甫河旺主编：《报禁开放以来新闻事业的省思与发展研讨会实录》，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暨研究所1991年版，第110—111页。